十年来对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的回顾和今后的展望

刘 涤 源

一、从禁锢到开放，起步艰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广大经济科学工作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和发展，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挥舞大棒，乱扣帽子，横加罪名，使经济科学工作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视为畏途；不敢探讨和评论它们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趋向，不敢认真对待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更不敢触及它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参考、借鉴和利用问题。这样，我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眼界受到局限，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报刊上出现过少数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文章，并出版过几本小型专著。但是，它们主要是着重批判，采用夹叙夹议的撰写方式，表述不确切，甚至有的难免曲解，使读者难以理解其本来面目和真实内容。而在十年动乱中，转入完全禁锢阶段，就连那种被扭曲了的文章和专书也都绝迹了。

在人力方面，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经济学科大学生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全国少数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沈阳等地的财经院系和经济研究机关散处着一些过去对西方经济学说有过研究的人士。当然，他们大都课业荒芜，而且心存悸惧，不少已经改换主攻方向。因此，这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要重新开展起来，起步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些学者们大都学有根底，毕竟不失为这种艰难起步的一股中坚力量。

二、十年来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由禁锢到开放，这是解放后我国经济学界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的转折点。

70年代末，80年代初，荒芜多年、几乎已被遗忘、在中国大地上快要绝种了的这个学科研究，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中，奋然起步，真是可以说近乎“从零开始”。现在回顾起来，不免

思绪万千。但是，近十年来，经过艰苦努力，同前此时期的那种凋零状态相比，不论在研究组织的健全方面、研究队伍的壮大方面、研究成果的增多方面，还是在研究影响的拓广和深化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现在简要加以介述。

（一）组织起来，开展学术活动

197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其中包括外国经济思想史：从古代直到当代的西方重要经济学家及其基本观点、学说，用词条形式，简明扼要地加以介述。1979年春夏间在杭州召开为时3周的定稿会议，对初稿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会议末期，讨论并通过了成立西方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倡议，由这次定稿会议的全体参加者作发起人，建议尽快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辞典》中外国经济思想史这一部分的编写、审稿和出版，对后来正式组织学会、开展学术研究活动，起了很好的先导作用。主要在于：其一，组织词条撰写和定稿会议对本学科研究队伍的现有势态作了一次初步摸底和检阅。其二，词条经过一稿、二稿、三稿的撰写和修订，然后提交定稿会议逐条、逐段、逐句认真讨论。斟字酌句，再由主编参考会议所提意见，进行补订、润色，最后交付出版。这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严谨治学精神。同时，词条在表述上力求不失原意，介述为主，然后简明扼要地指出其在本质上的是非得失，绝不夹叙夹议，这为本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树立了一个正规的文风。其三，词条比较全面，既包括古代近代西方经济学说，也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而且后者更为细致。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包括着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从古到今的全部内容，绝不应该把当代部分同前此部分割裂开来研究。其四，定稿会议聚集了当时国内对此学科有过一些研究的部分人士于一堂，认真切磋，并且倡议成立学会，为此后这一学科领域学术工作的开展，起了大力促进的作用。

1979年9月，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理事和干事长；规定全国各地、各省设立分会；定期召开年会。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是我国解放以来这个学科研究由凋零到复兴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工作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对此后这个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以及“洋为中用”，通过参考、利用和借鉴，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服务，并力图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

总会成立以后，不论是直接推动，还是间接倡导，对全国这一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在直接推动的学术活动方面，十年来主要有下列各项：

第一、为了增加对当代外国经济学及其研究情势的了解，总会受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组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的委托，在北京举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于1979年11月开始，每周一次，共60讲，由北京和外省市的四十多位同志主讲，大约一年半讲完，听讲者甚为踊跃。内容主要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各主要流派。后来，由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把这些讲稿，定名为《国外经济学讲座》分四册陆续出版。这对此后这个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总会每2—3年举行一次年会：1981年4月在成都开第一次年会，1983年7月在昆明开第二次年会，1986年10月在长沙开第三次年会。每次年会结合当时形势，确定重点讨论课题。如1986年正值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10周年，凯恩斯《就业通论》出版50周年，就确定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内容及其深远影响作为长沙会议的主要议题。每次年会都收到会员提出的许多论文，分别在大会发言或小组讨论中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大家收获不少。另外，

在两次年会之间，召开一次较小规模的工作会议。1984年10月在华中理工大学开第一次会议，主要交流这个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经验；1987年9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学说史教学与教材编写的改进问题。

第三、各大区、各省先后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分会，每年举行年会。如华东地区分会的年会分别由所属各省分会轮流作东道主在安徽、江西和山东等处举行。如中南地区分会的年会也同所属各省分会合作在武汉、广州等地召开。

不论是总会年会、还是分会年会，出席人数一次比一次多，特别是年轻同志增多尤为明显，而且涌现了一批新秀，表明这个学科的教学科研队伍正在日形壮大。

其次，间接倡导的影响也不少。主要有下列各项实例：

第一，教材建设和专著撰写方面，十年来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参考书和专著。有的教科书获得优秀教材奖。有的专著具有较高水平。全国各报刊上登载了许多有关专业论文，有的还编印了论文集。此外，商务印书馆同本会总会协作，组织编译、陆续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先后已出了十多集；又组译出版了《世界名著丛译》，如凯恩斯的《货币论》已出版，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即将分册出版，译文质量胜过台湾译本。还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有关专业论著和译著。所有这些，都对本学科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在开设课程方面，全国各财经院系大都开设了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课程。有的系科开设比较齐全，如经济学系及世界经济系开设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课程。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方面，特别受到学生的重视。

第三，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全国培养了相当大一批硕士，大都合格，其中达到优秀水平者不少；也培养了若干博士，博士论文基本合格，其中有的达到了优秀的水平。

第四，在“洋为中用”方面，鼓舞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些学校已开始了初步尝试。

（二）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取得的进展

上面列举了近十年来国内在这个学科领域方面所主办的重要事项。这些事项贯彻着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这种研究和应用，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包括当前阶段的经济改革和长远发展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进展和影响主要如下：

第一、端正了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基本态度，明确了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上述《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关于经济学说史部分的全部词条和《国外经济学讲座》的全部讲题，以及其他论文、论著、教材等等，在如何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这个重大问题上，大都抱着这样一种基本态度，那就是：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庸俗的，我们应当明辨是非，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地认真加以分析批判，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值得我们采择和借鉴。换句话说，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我们应当坚持科学的分析态度：一方面要认识到它的本质；就其整个理论体系而言，它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其中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有用成分。

80年代初期，出现了“精神污染”的过头解释，有人指责：研究、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是散布“精神污染”，一时阴云飞扬，大有风雨欲来之势。从事这种教学和研究的士人中，有的本来就余悸尚未完全消除，这样一来，“精神污染”这顶帽子更使人增加疑惧，信心发生

动摇。这对这个学科研究的开展十分不利。

陈岱孙同志在这种思想混乱局势中，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等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关于对当代西洋学说的评价问题，我国越来越多的同志同意这一观点，那就是：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态度：既要认识到它的庸俗本质，认真严肃地进行分析批判；又要承认它包含一些可供我国参考，借鉴和利用的东西。那就是说，“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思想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实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6日第5版。）我们既不要盲目推崇，全盘照搬，也不要一概排斥；而要认真研究，吸取其可供我们借鉴、利用的成分。这是个内容取舍的问题：既涉及本质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即如何最好地做到“洋为中用”的问题。

在如何评价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也就是研究这个分支学科的基本态度及其重要意义这个关键问题上，陈岱孙同志这种论点体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同志的共同认识，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不仅在80年代初期有力地抵制了“精神污染”的过头解释，稳定了这个分支学科研究队伍的“军心”；而且为这个学科教学科研的整个进程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二、明确了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目的性

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在历年年会中不少同志或多或少提及并讨论过这个问题。综合起来，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目的，可细分下列四项①：

其一，把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一个重要组成法分来研究。

严格地说，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包括从古到今的西方所有重要经济学说，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应被视为整个经济学说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前此部分相比。这个“当代”部分有其独特的格调和内容。以英美为例，半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涌现出持续时间最长、牵涉面最广、内容最纷纭复杂、辩论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空前特大论争。论争的中心是凯恩斯主义。此中包括两条战线：一是外部战线：凯恩斯主义者同以传统经济学教义为主导思想的各个对立流派之间的论争，形成半个多世纪来政府干预论与自由经营论两种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风云变幻局势。这条外部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是否正确。另一是内部战线：凯恩斯主义者内部各个支派之间的论争，主要是美国剑桥派同英国剑桥派的论争，形成“两个剑桥之争”。这条内部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凯恩斯本人的教义才算正确。

经济学说是经济情势的反映。由于现代西方经济情势发展的错综复杂，最近半个多世纪来西方经济学说纷纭变幻，流派众多，形成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一个空前庞杂谱系，在西方经济学整个发展史中，其多样性、复杂性、变幻性可以说达到了谱系宠杂、波澜起伏、气势汹涌的高潮。因此，我们一方面不应该把这个部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整个发展史中孤立地割裂开来，而且另一方面应该厚今薄古，对这个当代部分特别着重加以研究。

其二，明辨是非，提高马列主义经济理论水平。

经济学说是属于思想意识范畴，是有鲜明阶级性的。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学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信奉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存续，抹煞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而只围绕着一些次要因素、现象形态，加以概括、分析而编制出各种不够深刻，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论证和论断。另一方面，各个流派，各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各有其具体特

点，如凯恩斯学派着重需求、现代货币主义着重货币、供给学派着重供给，如此等等，众说纷纭。这里就存在一个明辨是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不骂倒一切，一棍子打死；也不盲目崇拜、拜倒在它们的脚下。既要揭露其抹煞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这种辩护性的根本缺陷；也要对其中某些比较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原理和论点适当加以肯定。既要对其辩护实质上的共性明确地加以揭露；又要针对其各自的个性：各派、各家的独特思路和论点，深入细致地进行分析评议。只有这样，才可使这种评议具有说服力，并提高我们自身明辨是非的理论水平，在众说纷纭中不致如坠五里雾中而迷失方向。

其三、知己知彼，加强对外开放实践在认识上的确切性。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同西方各国保持经济关系。由于西方各国具有各自的国情，而且情势复杂，因此必须对其经济情势有确切的了解，在对外交往中才可得心应手，免出差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屡验不爽的常理。在经济领域中，经济学说、经济政策与经济情势每每是三位一体地紧密结合着：经济情势的发展和变化，每每受某种经济政策的指导和支配；而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又每每以某种或某几种经济学说为理论依据。如果单纯着重经济具体发展和变化的考察和了解，而不把经济情势、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三者紧密关联起来，则对经济情势的研究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可以说，这势必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当前英美为例，对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任期以来两国经济情势的利弊得失进行考察，必须通晓新型自由经营论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政策；甚至还须结合传统自由经营论的新古典学派，进行对比分析，才能把它们的成效和缺陷看得比较深入而确切。只有这样，才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切实做到：情况准确，判断正确，对策稳妥，收到令人满意的良好效果。

其四、参考、借鉴和利用，加速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

这是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前面已经提及，后面还要另行论述，这里不必重复。

总之，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具有上述四方面的目的，不可偏废。但是，有些人从事这种学习和研究，却只热衷于“引进”来解决我国当前经济上存在的问题，而把其他三项目的加以忽视。这是一种关系重大的误解，必须加以澄清。

第三、关于参考、利用和借鉴问题

在总会及各分会的各次年会中，不少同志提及并讨论过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对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可供参考、利用和借鉴的问题。十年来我国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士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有益成分，能够供我国经济现代化这一宏伟建设中参考、利用和借鉴。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对这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进展，对这种有益成分的确认，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在深度上日益增加。陈岱孙同志在上述论文中对这个问题作过确切的明细分析。现在简要加以介述。

其一，利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条件。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社会科学，要准确地把握它，科学地分析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渊源和现有内容有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切忌一知半解和浅尝即止；二是要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可须臾离开。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从总体上和实质上把握西方经济学，预测其发展趋势，区分其糟粕和精华。

其二，利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准则。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纷纭，一般可分为正统派经济学与非正统派经济学。正统派经济学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历来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其区分标准是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在当代，居主流派地位的西方正统学派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居非主流派地位的正统学派是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西方非正统学派属于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代西方非正统学派经济学主要有新制度派经济学和激进派经济学。正统学派中的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均具有浓厚的辩护色彩，但在实用性方面前者逊于后者。非正统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地说，与正统派相比，其辩护性色彩和实用性色彩均淡薄得多。

一般地说，西方经济学中抽象层次越高的学科，科学成分越少；抽象层次越低的学科，科学成分越多，但即使是抽象层次高的学科，也包含着若干可用成分，微观经济学即是如此。而抽象层次较低的学科，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概念也往往是庸俗的。例如，西方国际经济学建立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用供求价格分析取代价值分析，缺乏科学的国际价值论，其理论基础是脆弱的。西方实用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经济政策学、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等，门类繁多，不一而足。这类学科抽象层次甚低，实用色彩正浓，可资借鉴的成分也较多。

其三，参考、利用和借鉴的明细剖析

西方经济学中究竟有哪些具体东西可供我国借鉴？陈岱孙同志作了明细剖析，指出有下述五个方面：

(1) 对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的研究。这包括企业组织、劳动管理、能源原材料的有效利用、工艺技术的改革、产品品质的更新、产品品种质量与市场的关系、成本计算、经济监督与审计等等。

(2) 宏观经济计划管理的研究。这即国民经济的综合计划管理。此中最可借鉴、利用的，要算“投入——产出”分析。

(3) 对西方微观经济学市场机制的研究。此中特别是产量、价格、市场供求的市场机制分析，可供我国计划管理下的商品经济有借鉴的价值。

(4) 关于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计量经济学。

(5) 对所谓“后工业社会”理论某些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大力研究“后工业社会”理论，揭露了不少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分配不均、社会危机严重等等。这些理论对我们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第四、我国经济工作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陈岱孙同志在1983年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届全国学术讨论会(即上述昆明会议)的报告中发出了意义重大的倡议：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尽快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多门类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世界经济》，1983年第6期第8页。)1987年又提出这一倡议：利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建立这种经济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创造。它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时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外国，包括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和经济现代化的经验。但任何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即使是科学的，在彼时彼地行之有效的，也不能作为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直接移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外国的理论和模式，好比食物，必须

经过消化吸收，才有用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这样。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应妄自尊大，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同时，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将外国的东西视为偶像而顶礼膜拜。外国的理论，即使是最优秀的，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

我们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主张借鉴其中的科学成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使命基本上有两条：一是进一步发展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学；二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大组成部分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但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有别，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和对象也存在着差别。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完成这一历史赋予我国经济学界的伟大使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和开放方针的今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立一个反映现阶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如上所述，近年来已涌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些论文和专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我国经济学界群策群力，深入钻研，精心创建，努力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第五、经济改革实践日益广泛的应用

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从产品经济转化为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在广度上不断扩展，在深度上日益增进，习用于西方商品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重要概念、计算方法和某些理论等等，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熟练与完善。兹举下列各例：

其一，在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方面，如供求法则、市场机制及其运行、总供给、总需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微观、宏观等等概念日益被经济改革决策人和执行者以及广大经济学界人员所接受，由陌生逐渐趋于熟悉。随着改革、开放以日益深入，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增大，这些基本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必然会继续扩展。

其二，一些西方经济的分析工具如成本——收益分析、项目评估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等，日益被经济学界所接受，有些企业对成本——收益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已开始加以运用，建设(投资)项目评估分析也在开始试行。

其三，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到各个流派的经济学说，十年来高等财经院系和师范学院的政教系；本科大都开设了这类课程，学生重视，他们对其中内容有所了解；研究生方面，培养了这个学科的相当多硕士研究生，其中不少成绩优秀，可望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家；还培养为数不多的博士研究生，有的成绩优秀，其论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第四，在应用经济方面，如财政学、货币与银行学、国际贸易理论等也都在体制改革中都相应地参考、利用、借鉴了西方有关学科的理论经验。

(三) 存在的问题

前面条述了我国十年来这个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上取得的进展。从备受挫伤的凋零状态中艰难起步，经过十年的努力，能够获得这些成效，实在深感来之不易。但是，同西方国家这个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势态相比，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相比，这些成效和进展就会显得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我们应当清醒地加以估计的。我认为，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分支中，我们这个分支学科在研究上的难度最大，任务最艰巨，而我们的研究队伍力量单薄，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最多。这就是我们这个分支学科在

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现将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经济科学的全部分支学科中，西方经济学说这个分支学科受极“左”思潮的摧残最重，可谓凋零不堪。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艰难起步，这个分支有了一些进展，但现在仍然伤痕累累。以研究队伍而论，这个分支学科人数最少，而且呈现着严重的中年“断层”状态：“老的老了，小的小了”。以借鉴西方经济学说，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历史任务而论，难度很大，对研究人员在学术造诣上的要求很高：既要通晓外国经济学说及有关知识，更要掌握并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而且深谙我国国情。但近年来出现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些年轻学生越来越不重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同创建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严肃使命是格格不入的。这是一个亟待谋求改善的重大问题。

第二，发展很不平衡。在我国经济科学的全体分支中，外国经济学说这个分支发展最不平衡。以地域而论，少数地区情势好一些，多数地区仍然比较贫乏，有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以各有关院系而论，少数院系好一些，多数院系力量薄弱，有的甚至还没有力量开设这类课程。这对我国财经院系学生普及并提高这个分支学科的知识方面，甚为不利。

第三，在国内经济科学的全体分支学科中，这个分支在受领导和社会重视的程度上是居于末位的学科。这个分科是理论性的、被视为“软”学科，没有如那些实用性强、被视为“硬”学科的其他经济学分支如财政学、货币金融学、国家贸易等那样给予重视。这个学会经费奇缺。许多同志希望创办一个专业学术刊物，至今只能徒论空想。总之，困难重重，学术活动的开展受很大局限。

第四，有些人员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内容理解不够完整、确切；有的甚至断章取义。在“洋为中用”方面，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够；有的甚至主张“金盘引进”，生搬硬套。

三、今后的展望

为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希望这个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今后十年（暂以十年为期）内比前此阶段有一个大得多的发展。主要方面是：

第一，在今后十年中，为了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需要，为了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更加扩大并加强这个学科的教学科研队伍，更加大大地敞开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大门；另一方面对培养人才在业务上的要求要严格掌握：除外文、数学两科达到规定标准外，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并且系统地、确切地通晓这个学科的内容。同时，对一些确有根底、治学严谨的老年学者（为数日减、而且为时无多）要妥善安排，使之充分发接“老母鸡”的传、帮、带作用。增加重点学科名额，并在有条件的院校设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重点突出，辐射推广，提高与普及紧密提高。

第二，充分发挥现有师资力量，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如200—300个合格的硕士生、100—150个合格的博士生。教委重视对国内培养的合格硕士、博士进一步深造，力争多选送一些优秀人才出国短期（一年或二年）进修，并保证按期回国服务。国家教委重视这个学科现有年轻师资在业务上的提高，委托有条件的院系举办短期（如一年）培训（进修）班，进行基本

（下转86页）

值指标可以综合计算以外，现在还未见其它可以综合计算的方法。

采用商品经济的价值指标，综合计算商品经济所达到的水平，以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除了可以横向比较以外，还可以进行纵向比较，人类进入文明时期，有了商品经济就有了价值，就可以利用价值指标来计算。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范畴内，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用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大变革，这三次大的变革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上都有反映，第一次大约是在一万年前，人类掌握了珍贵的金属材料——铁，完成了材料革命，有效地加大了人的体力，在手工业生产上首先反映了以“铁”为代表的生产力；第二次是发生在二百年前的能源革命，使劳动者冲破了人体的局限，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信息革命使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的途径不再完全依赖于加大人的体力和增加动力，而是凭借人的智力的放大、人脑和人体各器官的延长，思维领域的变革、创造能力的开发、社会心理的激励、人一机关系的改善、管理能力的加强，等等，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结构，改变了劳动的条件和内容，促进了社会劳动的智能化，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刷新了劳动生产力，这些深刻的变化，都引起了商品经济发生巨大变化。

据上分析，用商品经济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国除沿海部分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外，包括沿海和内地，以及边远地区有很多地方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的甚至还处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各地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跨越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其中包括缩短“合法的欺诈”的时间)。缩短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时间(资本主义起码花了两百多年)，向更高级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世界经济的行列。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
(上接94页)

理论的系统学习。国家教委引导边远地区财经院系努力培养(如委托代培等方式)这个学科的师资，尽快克服当前各地区、各财政院系之间的高度不平衡状态。

第三，加强“洋为中用”，对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着重进行研究，特别对其中的一些新问题，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实质问题、国营企业所有制的调整问题等等，参考国外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作出实事求是的、顺理成章、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解说。积极组织力量，编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第一步，以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为基础，分别召开小型讨论会，对其主体、结构、理论概括等等认真、细致、深入地加以研讨，供著者修正、增订、及早再版的参考，使之日趋成熟。

第四，教委和社科院协助：创办这个分支学科的一个学术性的理论刊物；并组织力量撰写、出版有关这个学科的一套高水平的专著丛书。

综括以上关于十年来对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的回顾和今后的展望，本人水平有限，概括、分析和论述难免缺误，务盼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修正幸。

注释：

① 参见刘涤源：“略论学习，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目的和若干要领”，《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37—49页。